

## 《史记》“东伐淮夷”新考<sup>〔\*〕</sup>

○ 欧波<sup>1</sup>, 胡长春<sup>2</sup>

- (1. 安徽大学 文学院, 安徽 合肥 230039;  
2. 西南大学 美术系, 重庆 400700)

〔摘要〕淮夷是周代对居住在淮河流域民族的称呼。其与周政权时战时和。《史记》等文献记载周初成王时曾经征伐过淮夷,而出土的周初金文材料却只有征伐东夷的记载。这一矛盾由汉人的错误认识造成,周初并未征伐过所谓的淮夷。

〔关键词〕东夷;淮夷;书序

西周初年征伐淮夷,见于大量的汉代文献中:《史记·周本纪》:“召公为保,周公为师,东伐淮夷,残奄。……既绌殷命,袭淮夷,归在丰,作《周官》。……成王既伐东夷,息慎来贺,王赐荣伯,作《贿息慎之命》。”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:“管、蔡、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。周公乃奉成王命,兴师东伐,作《大诰》。遂诛管叔,杀武庚,放蔡叔。……宁淮夷东土,二年而毕定。”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:“成王既幼,管蔡疑之,淮夷叛之。于是召公率德,安集王室,以宁东土。”《尚书序》:“武王崩,三监及淮夷叛,周公相成王,将黜殷,作《大诰》。……成王东伐淮夷,遂践奄,作《成王征》。成王即践奄,将迁其君于蒲姑,周公告召公,作《将蒲姑》。……成王既黜殷命,灭淮夷,还归在丰,作《周官》,周公告《立政》。成王既伐东夷,肃慎来贺,王俾荣伯,作《贿肃慎之命》。”《尚书·费誓》:“徂兹淮夷、徐戎并兴”。《书序》“鲁侯伯禽宅曲阜,徐、夷并兴,东郊不开,作《费誓》。”《论衡·儒增》:“成王之时,四国篡畔,淮夷、徐戎并为患害”。

作者简介:欧波(1984—),安徽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及出土文献;胡长春(1966—),西南大学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〔\*〕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汉字的写刻与汉字字体发展演变研究”(批准号12YJA740023)成果之一。

现在可见的,明确为周人征伐淮夷的青铜器包括:录戣卣、稻卣、甹生盃、师寰簋、仲懷父鼎、兮甲盤、駒父盃蓋、敌簋、禹鼎、虢仲盃蓋、晉姜鼎、曾伯漆簋、晉侯銅人等。以上诸器时代各家所定不同,但大多认为属于西周穆王以后。

明确为周人征伐东夷的青铜器包括:禽簋“王伐豳侯,周公某”,冈劫卣“王征豳”,冈劫尊“王征豳”,豐方鼎“佳周公于征伐东尸,丰白、專古,咸戣”,旅鼎“佳公大保来伐反尸年”,寯鼎“佳王伐东尸”,保员簋“佳王既寮,厥伐东尸”,鲁侯尊“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”,寯鼎“王令趙戣东反尸”,小臣謎簋“东尸大反,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尸”。以上诸器时代各家所定不同,但大多认为属于西周早期的成王、康王时代,无一晚至穆王时期。

其中可考的东夷地名包括“豳”、“丰白、專古”等。唐兰认为“豳”应读为“盖”(林和卣通用,去和盍通用),《墨子·耕柱篇》、《韩非子·说林》所说的周公伐商盖,就是《左传》昭公九年的商奄,也就是《尚书》上的奄。<sup>[1]</sup>陈梦家指出“所伐之国,疑即盖侯。……盖侯即孟子所说的奄君。《说文》‘邠周公所诛,邠国在鲁’,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‘鲁国古奄国’,《周本纪》《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云兖州曲阜奄里即奄国之地”。<sup>[2]</sup>

丰,古国名。旧多认为在山东地区,陈梦家认为在曲阜西南,<sup>[3]</sup>马承源等认为在益都,<sup>[4]</sup>即今潍坊市、青州市境。2008年至2010年间,淄博市北部高青县发掘了一处西周及东周时期的墓葬和遗迹,其中M18出有7件带“丰启作厥祖甲公宝尊彝”、“丰启作文祖齐公尊彝”、“丰作厥祖齐公尊彝”、“丰启作祖甲宝尊彝”等铭文的青铜器。<sup>[5]</sup>M18墓葬的时代约为西周中前期。李伯谦、方辉、李零等认为此丰即周公东征诸器铭文中的丰。<sup>[6]</sup>丰白即丰伯,指丰国国君。

專古,陈梦家指出即薄姑(或作蒲姑),……《济水注》曰:薄姑去齐(案指临淄)六十里。……济水又经薄姑城北,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曰博昌县有薄姑城。《地理书》曰吕尚封于齐郡薄姑。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,近济水,史迁曰:胡公徙薄姑。城内有高台。……《续山东考古录》博兴县下云“薄姑国城在东南十五里,今柳桥”。<sup>[7]</sup>薄姑当在今博兴县东南,在高青县遗址东部不远。

由铭文可知,周初征伐的主要方向为东,主要征伐对象为东夷。金文中的丰、薄姑、奄等皆在今山东境内,地理方位上正在周人的正东方。周初的东夷,当指在山东中北部一带活动的民族。

春秋时代,文献中也有东夷的记载,主要见于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,如:《左传·僖公四年》:“陈轅涛涂谓郑申侯曰……若出于东方,观兵于东夷。”杜预《注》:“东夷,邾、莒、徐夷也”。邾、莒、徐之地在今山东南部,江苏北部。《文公五年》:“六人叛楚,即东夷。秋,楚成大心、仲归帅师灭六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中》:“楚有五败,晋不知乘,我则强之。背宋之盟,一也。……夷、郑从之,三陈而不整,五也。”韦昭《注》:“夷,楚东之夷也。”由金文可知,周初东夷所指大约在今山东省范围内,东周文献中所记的东夷,其地域涵盖了今山东南部、安徽南部、江苏及浙江北部地区,其地区十分广大。而且东夷与楚越两国关系密切,其活动主要区域

当在楚越两国之间。其地域比金文中周初的东夷范围扩大了许多。两汉以后，东夷所指的范围仍在不断的扩大，广义上东方土地上的民族皆被称为东夷，甚至东北方和东南方的少数民族也被称为东夷。这是由于中国的领土不断扩大，与其它民族的接触交流越来越多，因此所谓的东夷及其范围也在不断的增多、扩大。

周初金文中不见征伐淮夷，较为原始的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等也不见有周初征伐淮夷的记载，而汉代文献中有大量的周初征伐淮夷的记载。对于这种情况，顾颉刚先生认为“古代淮、淮、维等字通用，山东地区的淮水即古代的淮水，在山东半岛的西部，淮夷最早的根据地就在那里，族名和水名出于同源。至于现今的淮河，这个名词乃是由山东南移到江苏、安徽和河南去的，因为周代几度东征之后，有一部分淮夷被迫迁徙到那里，水名就被带过去了。……迁到淮河流域的南淮夷，在西周时代常常起兵反周，到周宣王时才被平定，但这国继续存在。”<sup>[8]</sup>黄盛璋先生则认为“淮夷是以淮水流域部落的总称，原先在淮水下游，殷代晚期逐渐向今山东南部扩展，所以殷代亦统称为东夷，尔后又被周公所驱逐。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：‘武乙衰弊，东夷寝盛，遂分迁淮夷，渐居中土……周公征之，遂定东土。’‘周公为师，东伐淮夷，残奄’。可见东夷中占主要的就是淮夷。……《尚书·费誓》‘淮夷、徐戎并兴’，与伯禽战于鲁东郊之费，证明淮夷自晚殷以来势力确达东土。《书序》：‘成王伐淮夷，遂残奄’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成王‘袭淮夷，归在丰’，下文又说‘成王即伐东夷’即……东夷作淮夷，‘分迁夷岱，渐居东土’，淮为淮水，岱即泰山，必已由淮水伸及鲁南，但即为周公父子驱逐出东土以后，又南退到原来老家淮水中下游，直到海滨，所以又称为南淮夷或南夷。所以其分布主要在南不在东，看来此后再不向东土与周争夺，而是溯淮西上，逐渐占居淮水上游地区。”<sup>[9]</sup>

顾、黄二先生皆认为淮夷在不断迁徙移动。顾先生认为淮夷在周初由淮水向南部淮水流域迁徙，而黄先生认为淮夷在商末由淮水流域向北部的山东地区迁徙，在周初又被驱赶回淮水流域。但淮夷的迁徙并无明确的记载，更不要说是如何迁徙了。

陈梦家先生则指出：（从西周青铜器铭文可知）“穆王以前东尸为患，穆王以后南尸为患，南尸之中以南淮尸为最”。<sup>[10]</sup>

从铭文可知，西周认为淮夷在南方。在夔生盃铭中，“王征南淮夷，伐角、津，伐桐、邇”等地，而噩侯驭方鼎铭文为“王南征，伐角、儒”。所征伐之地相同，一为征伐“南淮夷”，一为“南征”，可见在周人心中，淮夷所处地理方位在周人之南。兮甲盘铭文前用“南淮夷”，后称为“淮夷”，可见淮夷即南淮夷。而文献中淮夷皆在淮水流域，即周的东南方。

《诗·鲁颂·泮水》：“济济多士。克广德心。桓桓于征。狄彼东南……憬彼淮夷，来献其琛。元龟象齿，大赂南金”。《传》：“南，谓荆扬也”。鲁国征伐的方向是东南，对象是淮夷。龟、象皆南方之产，南金指南方所产的青铜原料，也可

见淮夷主要活动区域在鲁国以南地区，而不是鲁国以东的淮水流域。《尚书·禹贡》：“海岱及淮惟徐州。……淮夷蠙珠暨鱼，厥篚玄纁，浮于淮泗，达于河。”淮夷所处之地在泰山以南，淮河以北，东至大海的徐州，即淮河以北地区，不在泰山东北的淮水流域，其所贡的龟、象齿、珠等皆为南方的特产。

“淮”和“淮”在古籍中确有混用，但主要是音近的通假字。《尚书·禹贡》中两河并有记载，“海岱惟青州，嵎夷既略，淮淄其道。……海岱及淮惟徐州，淮沂其又。……导淮自桐柏，东会于泗沂，东入于海”。可见至迟在战国时代，古人对两水已有明确的认识和区别，不会随便混同。

在汉代，淮河流域地区在版图的东南方。汉代人的心中，淮河流域也属于东方。上引《史记》中征伐淮夷的记载多将淮夷与东方联系，如《周本记》：“东伐淮夷”，《鲁世家》：“东伐……宁淮夷东土”，《太史公自序》：“淮夷叛之。于是召公率德，安集王室，以宁东土”。《尚书序》：“成王东伐淮夷，遂践奄”。淮夷在汉代人的心中广义上也属于东方之夷，自然也可称为东夷。《尚书序》前言“成王既黜殷命，灭淮夷”，后言“成王既伐东夷”。

文献记载中，西周中后期直至春秋时代，淮夷一直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敌人和威胁，汉人误认为淮夷在西周初期便与周王朝发生过战争，将西周初期山东地区的东夷误认为是淮河流域“淮夷”了。如此造成了汉代文献中周初同时征伐东夷和淮夷的记载。

汉代山东为齐鲁旧地，经过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的发展，经济文化已经十分繁荣。而鲁国又是孔子家乡，在“独尊儒术”的社会大背景下，山东地区在汉人的心中不可能被认为是蛮夷居住之地。《史记·齐世家》记载“齐自泰山属之琅邪，北被于海，膏壤二千里，其民阔达多匿智。”《货殖列传》记载“故泰山之阳则鲁，其阴则齐。齐带山海，膏壤千里，宜桑麻，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。……而邹、鲁滨洙、泗，犹有周公遗风，俗好儒，备于礼，故其民颀颀。颇有桑麻之业，无林泽之饶。”可见汉代山东的齐鲁地区土地肥沃，经济以农桑为主。民风有“周公遗风”，与西周初期的蛮夷之地毫不相干。

而淮河中下游及江淮之间地区的经济文化仍旧比较落后，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“夫自淮北沛、陈、汝南、南郡，此西楚也。其俗剽轻，易发怒，地薄，寡于积聚。……徐、僮、取虑，彭城以东，东海、吴、广陵，此东楚也。其俗类徐、僮。……楚、越之地，地广人希，饭稻羹鱼，或火耕而水耨，果隋蠃蛤，不待贾而足，地势饶食，无饥馑之患，以故砮窳偷生，无积聚而多贫。是故江、淮以南，无冻饿之人，亦无千金之家。……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，是南楚也，其俗大类西楚。郢之后徙寿春，亦一都会也。而合肥受南北潮，皮革、鲍、木输会也。与闽中、干越杂俗，故南楚好辞，巧说少信。”九江，《正义》曰：“九江，郡，都阴陵。阴陵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六十五里。”寿春即今寿县地区。其中的九江、寿春、合肥皆在淮河流域，这些地区虽有一些都市，但大多地方仍旧是“火耕而水耨”，“不待贾而足”，“无积聚而多贫”，可见其经济仍旧落后，又与闽、越地区蛮夷杂俗，民风

不实少信。可见在汉代这一地区仍被认为是蛮荒未开发之地。

从西周至汉代近千年,西周初期被认为是东夷的山东地区已发展成为文明富庶之地,而淮河流域发展则远落后于山东地区。西周时代的淮夷,到了汉代虽然已经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,但与中原地区相比,其经济文化仍显落后,在汉人的心中,这一地区自然就是古代的东夷之地了。

对于《尚书·费誓序》记载的鲁侯伯禽征伐淮夷之事,《史记·鲁世家》的记载与《书序》同,说周公在王朝辅佐成王,伯禽就封于鲁,管、蔡、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。百篇《尚书》,从《尧典》到《泰誓》,分为虞夏商周四代,各代的《书》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。《费誓》,又名《肸誓》、《鲜誓》、《狄誓》,字皆音近通假,属于周代之书,但此篇在今古文《尚书》及《书序》中的位置皆偏靠后,《尚书·尧典》疏:“孔以《费誓》在《文侯之命》后,第九十九。郑以为在《吕刑》前,第九十七”。《尚书大传》中的《鲜誓》即《费誓》亦在《吕刑》前。古文《费誓》在《顾命》后《吕刑》前,《吕刑》前还有逸书《毕命》、《丰刑》、《君牙》、《囧命》等,其中《毕命》、《丰刑》为康王时书,《君牙》、《囧命》为穆王时书。《顾命》所记为成王遗命及康王即位典礼,《吕刑》所记为穆王时事,按时间顺序,《费誓》所记当为康王至穆王时事。

今文《费誓》在《文侯之命》后《泰誓》前,《文侯之命》所记为东周平王赐晋文侯命之事。可见今文和古文《尚书》中的《费誓》排列皆太靠后,所记不是周初伯禽时事。

对于这个问题,清儒早已怀疑。孙星衍指出:“史公说淮夷、徐戎反为在与管、蔡同时。《鲁世家》前文亦云:‘于是卒相成王,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。管、蔡、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。周公乃奉成王命,兴师东伐,作《大诰》’。《周本纪》云:‘召公为保,周公为师,东伐淮夷,残奄’。又云:‘既紕殷命,袭淮夷,归在丰,作《周官》’。是伯禽先伐淮夷,在管、蔡以殷畔之时。周公伐淮夷,在归政践奄之后也。但伯禽封鲁,据《洛诰》经文‘命公后’及‘惟告周公之后’,则在七年归政之时,此云即位之后有管、蔡、淮夷等反,殊不可解。史公从安国问故,又用伏生所传今文,故说有歧异。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云:‘康王之时,肃慎复至。后徐夷僭号,乃率九夷以伐宗周,西至河上。穆王畏其方炽,乃分东方诸侯,命徐偃王征之。’此疑今文说。则鲁公征徐戎,在穆王时。故编篇于《顾命》后《吕刑》前也”。<sup>[11]</sup>作为今文学家的皮锡瑞,虽然认为孙说大谬,但也指出“史公以《肸誓》在周公摄政时,似亦不应列此”。<sup>[12]</sup>

段玉裁指出按书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。对于《费誓》的书序,古今文皆同。今文《书序》传出自孔子,古文《书序》则传出自孔壁,后马融、郑玄等整理成书,并为之作注。《书序》为孔子所作,宋儒多已怀疑。朱熹认为“小序不可信”,“某看得《书》小序不是孔子自作,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”。<sup>[13]</sup>蔡沈《书集传·书后序》:“识见浅陋,无所发明,其间至有与经相戾者。于已亡之篇,则依阿简略,尤无所补,其非孔子所作甚明,顾世代久远,不可复知。然孔安国虽言得之壁中,而

亦未尝以为孔子所作”。<sup>[14]</sup>近代陈梦家认为其是“秦汉之际解经人所作”。<sup>[15]</sup>

《史记》中引今文《书序》最多,可见《书序》在司马迁时已存在,《史记》的大量引用,马融、郑玄等为之作注,反映了汉人对其的认同。其中《费誓》所记为周初征伐淮夷之事当汉人的认识。

近代以来,随着对《尚书》研究的深入,《书序》中的一些错误得以纠正。《高宗彤日》、《书序》、《史记》皆以为是高宗武丁祭祀成汤之事。王国维<sup>[16]</sup>、郭沫若<sup>[17]</sup>等依据出土卜辞,指出此为彤祭高宗武丁,彤为商代祭祀的一种。《文侯之命》,古文《书序》认为是周平王赐晋文侯命而作,而今文《书序》、《史记》皆以为周王赐晋文公重耳命而作。刘起釞先生指出此为周平王赐晋文侯命事,<sup>[18]</sup>辩之甚详。可见《书序》不可尽信。《费誓》当如孙星衍所说,时代当在康王之后,穆王之时。这也可与西周铭文相印证。

综上,周初征伐淮夷的记载当是汉人的误记。由原始的金文材料可知周初征伐的对象为山东地区的东夷,淮夷在西周中后期才成为周人的主要敌人。从西周到汉,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,由以河南、陕西为核心不断向外扩展。以前所谓的蛮夷之地的经济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,所谓的蛮夷也渐渐的融入到华夏民族中。西周初期所谓的东夷在汉代已是经济发达、文化昌明之地,而所谓淮夷在汉代也成为华夏族一部分。淮河流域也有了大的发展,汉高祖刘邦便是淮北沛县人,而淮南地区也有了一些大的城市。

### 注释:

- [1] 唐兰:《西周铜器断代中的“康宫”问题》,《考古学报》1962年第1期。  
 [2][3][7][10] 陈梦家:《西周铜器断代》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28、18、18、317页。  
 [4] 马承源主编: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,文物出版社,1998年,第17页。  
 [5]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:《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》2011年第2期。  
 [6] 李学勤等:《山东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笔谈》,《考古》2011年第2期。  
 [8] 顾颉刚:《徐和淮夷的迁、留——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五》,《文史》第三十二辑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19-20页。  
 [9] 黄盛璋:《驹父盨盖铭文研究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3年第4期。  
 [11] 孙星衍: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510页。  
 [12] 皮锡瑞:《今文尚书考证》,中华书局,1989年,第469页。  
 [13] 朱熹:《朱子语类》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1985页。  
 [14] 蔡沈:《书集传》,《朱子全书外编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年,第278页。  
 [15] 陈梦家:《尚书通论》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97页。  
 [16] 王国维:《高宗彤日说》,《观堂集林》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27-30页。  
 [17] 郭沫若:《卜辞通纂》,科学出版社,1982年,第22页。  
 [18] 顾颉刚、刘起釞:《尚书校释译论》,中华书局,2005年,第2128-2136页。

[责任编辑:钟 和]